

永仁社会科学丛书



杨甫旺 著

彝族文化论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杨甫旺 彝族，1962年9月生，云南省永仁县人，硕士。现为楚雄师范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级重点学科、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民族学”负责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云南彝族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彝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创新团队带头人，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州厅级社科项目2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16部，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20余次受国家、省、州级奖励。

永仁社会科学丛书

彝族文化论

杨甫旺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彝族文化论 / 杨甫旺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

(永仁社会科学丛书)

ISBN 978-7-222-11782-2

I. ①彝… II. ①杨… III. ①彝族 - 民族文化 - 云南省 - 文集 IV. ①K28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391号

责任编辑: 林 劲

封面设计: 窦雪松

责任校对: 林 劲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书 名	彝族文化论
作 者	杨甫旺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80千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印 刷	 楚雄洪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782-2
定 价	20.00 元

目 录

论彝族俚濮文化的形成 / 1

江南遗风：云南“两姚”彝族对汉文化的吸纳与传承 / 22

土主崇拜的起源和发展 / 44

巫释道合流的彝族宗教信仰 / 86

民族传统节日的共生、传承和转型

——彝族赛装节个案研究 / 106

滇中直苴彝族民间文学中的神灵禁忌思想析论 / 115

彝族村落社会中女性择偶观的转变及影响

——滇中直苴村的个案研究 / 128

彝族丧葬禁忌文化析论

——以云南直苴彝族非正常死亡者丧葬个案为例 / 141

直苴彝族丧葬礼物及内涵分析 / 152

彝族创世古歌《冷斋调》的生死观 / 164

直苴彝族“梅葛”的流变与传承 / 176

论彝族猎神崇拜 / 190

温暖心灵

——《永仁社会科学丛书》后记 / 李明峰 / 205

论彝族俚濮文化的形成

一、俚濮的形成

滇中楚雄（包括今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会理县）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灵关道”的主要通道，历史上被誉为“川滇通道”。据载，灵关道由成都通往西昌、盐源，由攀枝花拉鲊渡金沙江至永仁方山，或元谋龙街渡江经黄瓜园、物茂至永仁，然后向西南经猛虎、宜就、江底河至大姚起家店、新街、仓街、左门、鱼泡江、普棚、祥云，与“五尺道”相汇^①。灵关道所经之地，基本上为今彝族俚濮的主要聚居区，即俚濮村主要分布在灵关道沿线周围，并且一些重要的俚濮村落都有灵关道的岔道与之相联接，如永仁县的中和、直苴，大姚县的龙街、六苴等。受灵关道“马帮”经济的影响，在古道附近逐渐形成了一些重要的驿站，如今攀枝花市会理县的黎溪、大龙潭乡的拉鲊、平地镇的迤沙拉，楚雄州境内的龙街、物茂、猛虎、赵家店等，现在都是俚濮的主要集镇。由于地处灵关道沿线，沿线的彝族先民与外来文化很早就有频繁的接触、交融，使这一带的彝族先民的社会经济文化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为明清以来大量地吸收、交融汉文化打下了基础。

俚濮是彝族俚濮支系的自称，还有部分自称“骂池濮”，他称则有白彝、黎族、傈僳、骂池等，操彝语中部方言俚濮土语。据1958年楚雄彝族自治州建州前的调查，俚濮人口计有93800人，主要分布于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县的赵家店、新

街、龙街、六苴、昙华、石羊、三台、三岔河、铁锁，永仁县的永定镇、维的、莲池、宜就、猛虎、中和，元谋县的新华、物茂，姚安县的左门、官屯，牟定县的戌街、凤屯以及四川省攀枝花市的仁和区、会理县等。在彝语中，“濮”带有“人”或“族”的含义，“俚”则有百姓之意。

关于俚濮的形成与南诏民族大迁徙有关。在楚雄州西北地区姚安、大姚、永仁等县，是南诏争夺金沙江以北的嵩州，乃至进兵成都的前沿阵地。尤其是姚安县境，自公元664年（唐高宗麟德元年），唐朝在弄栋川（姚安坝子）设立姚州都督府后，战火连年不断。在天宝战争中，阁罗凤攻陷姚州，其后又于公元753年（天宝十二年）击败率师前来再置姚州的贾瑛，致使弄栋川中“悉无汉人”；原世代居住在弄栋川内的“弄栋蛮”也被迁往滇西北的剑川、鹤庆一带。到公元749年（唐贞元十年）南诏筑弄栋城、置弄栋节度时，弄栋城只是“管杂蛮数部落”。相邻的原青蛉县（今大姚、永仁，属嵩州所辖），原住民“青蛉蛮”则是嵩州第一次被攻陷后，在其尹氏尊长的率领下，于公元756年（唐至德元年）主动迁徙到洱海地区。弄栋节度是南诏的军事重镇，大姚、永仁一带又属渡金沙江经营江北嵩州的战略要地，弄栋蛮和青蛉蛮被迁徙之后，这里地广人稀，南诏亦必派亲信军将率亲兵（源自洱海区域的部队）驻守，并移乌蛮、白蛮到这里充实人口。移入的乌蛮、本地未迁徙“杂蛮”、部分长期驻守的退役军士，经长时期的发展，逐步形成自称“俚濮”的彝族。今俚濮彝族毕摩念诵的“指路经”，是从自己的所居地界先指到“苴却咪”（永仁县城），再经“亚安咪”（即姚安，部分大姚、姚安的俚濮彝族则直指姚安）、“勃勒咪”（祥云），最后指到

“蒙舍咪”（即蒙舍诏，亦即南诏的发祥地、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境），认为“蒙舍咪”是“俚颇俚摩”即俚濮的男女祖先居住的地方。又，南诏彝语称百姓为“俚柔”，今存南诏末期清平官赵叔达所写的含有彝语词汇的《法驾避星回》诗中有“下令俚柔洽，献琛弄栋来”之句，其“俚柔”下有原注云：“俚柔，百姓也。”“俚柔”一词在现今彝语中是俚濮彝族的族称，也是俚濮青年男子的自称之一（“柔”，今人多写作“惹”或“儒”，彝语中意为男子、子孙、人或族）。此诗除表明南诏政令畅通外，还指明前来“献琛”的“俚柔”是从弄栋节度范围内、即今俚濮彝族聚居的姚安、大姚、永仁一带带来的。

俚濮为本地世居居民，主要是由两部分构成：

1. 白罗罗

今云南永仁县、四川省攀枝花的俚濮大多认为是白彝，即白罗罗。正德《云南志》卷九“姚州风俗”条说：“本州土人有四种：曰僰人、曰罗罗、曰百夷、曰散摩都……散摩都类罗罗。”又清乾隆《姚州志》卷一“风俗”条引高爵映《问愚录》说：“在州四界山中者为白僰罗，常入城为市……附近直却彝曰罗婺，类僰罗而顽，亦甚贫苦，畏法多疑，遇事则鼠首。”康熙《大姚县志·种人志》进一步说：“白罗罗，性驯……男子裹头跣足，披黑羊皮；妇人辫发青布缠头，披白团毡片，胸前束围腰布，结带，缀五彩缨拂。四五岁即嫁娶。娶之日，夫家以羊酒往返，女家以人负女送其门。入室后不合爿，男女杂坐饮酒，饮毕女仍回母家，俟及岁，始婚配。常男女皆入城，市贸麻布、麻线、蜂蜜、松明之类。东北界近城十六里均有之。”此记载，与近200年来俚濮的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

相近。“白罗罗”有时也被地方史志称为“撒摩都”。《滇志》卷三十“羈縻志·种人”说：“白罗罗，……在江川、大理、姚安，皆称撒马都。”康熙《姚州志》卷一“风俗”云：“彝种有七，居近城郭与汉僰杂处者，为撒摩都，后皆汉化，衣服包含渐与汉僰相同，城彝种之善变者。”可见，至清代中期，在城郭附近及交通沿线的白罗罗或撒摩都，已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汉化，衣服、饮食等风俗习惯与汉族相同，形成了与黑罗罗有一定差别又不同于汉族的新的支系。至清道光年间，大姚、永仁等地的汉族人口居多，而彝族等少数民族逐渐减少。道光《大姚县志·种人志》曰：“今之种人亦渐少矣。其在元明，汉十之三，种人十之六，客居居其一焉。所谓客民，近城则江右为多，苴却则闽粤为多。近数十年来，黔、楚、西蜀之人充斥境内，种人日渐凋零。”说明随着汉族的大量进入，白罗罗与汉族进一步融合，经济与汉族相当，与居住山区的黑罗罗的区别拉大。

值得注意的是，俚濮的分布区域明清时期多是姚安高土司的领地。姚安高氏自唐至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统治今大姚、永仁、四川攀枝花市等地1000多年。康熙年间，清军大败吴三桂攻入云南后，其52世高爵映降清，授土同知职，其所辖三姚（姚安府、姚安州、大姚县）彝民，东至今元谋县界，南至牟定县界，西至云南县（今大理州祥云县）界，北至宾川州永北县（今丽江市永胜县）界。道光《大姚县志·杂异·盗用印文》载：“苴却十马地方，自古荒芜，每年纳马，故以马名。每马彝长一名，曰头马，各辖数村或十余村，谓之马脚庄。自前朝洪武以来归土司管，康熙二十三年，改归县辖。”这个土司，即姚安府赫赫有名的高土司。传至54世高

映厚时，由于他“德以不检失职，逐停袭”。该志卷十四《大姚县辖十马编里改正碑记》说：“苴却十马，地属大姚北界，自前朝洪武开滇以来，钱粮盐课俱系县辖征解，载在版图，并无混乱。”康熙二十三年推行改土归流后，高土司失去既得利益，窜通地方官员伪造申文，呈请上宪将钱粮交土司催征，高氏便“逞势越分，蒙混贿嘱骗夺十马，横征暴敛，百计搜罗”，十马头人冯天昭、倪楚珍、倪金、倪暖、倪成、倪遵守、倪世邦、纳鲁、杨三月保、李户、王全、单白臻等，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联名上书朝廷。清政府于同年六月对高映厚采取措施：“改马为里，归入里甲。”在十马进行彻底改土归流，十马之地结束了封建领主制进入了封建地主制。苴却十马之地均为白罗罗，现为俚濮聚居区，“改马为里”，使俚濮聚居区的政治经济形态与汉族相一致，促进了俚濮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2. 嫫且

据朱和双先生在《清代云南楚雄彝族史料所见“嫫且蛮”考证》一文中考订，认为“嫫且”是金沙江南北两岸的“俚濮”族群在清代的一种自称。近代以后多写为“骂且濮”、“骂池濮”。^②据笔者调查，今彝族俚濮中确有一部分人自称“骂池人”或“骂池濮”。如今四川会理县通安镇彝族自称“骂池濮”，攀枝花市啊喇彝族乡彝族亦自称“骂池人”，永仁县永定镇太平地村委会有骂池村，村民自称“骂池濮”，据说20世纪50年代还有两名老年妇女能讲骂池语，其语言当地彝族均听不懂。大姚三台、桂花一带的彝族自称“俚濮”、“骂且濮”，但多数情况下以“骂池濮”来互称。^③

据朱和双先生的梳理，“嫫且”一词最早出现于清初高翥

映的《问愚录》。康熙《姚州志》卷一“风俗”云：“彝种有七……嫫且一种，南中诸志纪所遗也，尚丑为正月，好饮，性任犷荡，男妇作欢，鸣叶、吹新、弹箴、弄枯，则皆音节流畅，合彝曲而杂和之，其声暗然咿然，亦可听。饮竟月而忘返，不知节用，过此则终岁饥寒，惟寻野菜充腹而已。性亦疑畏，百十里之外，足迹多罕至者。”高翥映所说的“嫫且”，指的是金沙江南岸大姚县昙华山一带的彝族。^④根据乾隆《皇清职贡图》绘制的“嫫且”人物形象：男子留胡须，面目有些“狰狞”，侧面弯腰站立，双手拿笙吹奏；青布缠头，穿一黑白相间羊皮褂，内穿黄布短衣，下穿青布裤子，跣足；女子为正面站立，双手拿笛吹奏，青布包头，披羊皮毯子，上穿黄布长袍，下穿青布裤子盖住脚面，跣足。^⑤人物图像与近代大姚县昙华、三台、桂花等地的服饰及“打跳”活动极为相像。从图像上也可以看出，“嫫且”的经济文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似乎早已脱离了“未开化”的阶段。^⑥

“嫫且”的前身是“青蛉蛮”。樊绰《云南志》卷四说：“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部落。天宝中，嵩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湟，阁罗凤厚待之；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伊求宽，皆其人也，衣服言语与蒙舍略同。”此时的“青蛉蛮”已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且在南诏时期得到了大的发展。青蛉蛮多姓“尹”，发展程度较“乌蛮”要高一些，其中一部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嫫且”。^⑦明清时期，在汉文化的进一步影响下，“嫫且”的经济文化与汉族相距不远。1947年，由云龙总纂的《姚安县志》引用康熙《姚州志》和《皇清职贡图》中“嫫且”的记述，但在“按语”中却说：“雪君先生所志，姚安彝种，昔虽有八，除

僰人、撒摩都，久已汉化。其僰僰、罗婺、摆夷等所居地，又已划属盐丰、永仁，实仅白夷、黑夷、嫫且三种，近亦多通汉语，习汉俗。依调查方言所得，各山夷语大体相同，黑白之分，已不可辩。”^⑧由云龙先生“按语”不太准确，白夷、嫫且等均已汉化，且“黑白不可辩”，但民国时期姚安、大姚、盐丰及永仁都有白夷、嫫且分布，仅只永仁县“嫫且”人数要少一些（仅限与大姚桂花等地相邻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民族识别，归并白夷、嫫且均被俚濮所取代之。

关于俚濮的外来民族部分，主要是元明清时期由内地迁入的汉族。楚雄彝族地区很早就有内地汉族迁入，如最早的庄蹻开滇，汉置郡县，诸葛亮南征等。但这些移入的汉族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变成了少数民族化（夷化）的大姓及其统治下的部曲宾客，以致出现了南北朝时期的爨氏割据。爨氏祖先就是中原地区来滇的汉人。南诏大理国时期，经过民族大迁徙，改变了楚雄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新的民族成分，封建领主制逐步形成，但元代之前进入楚雄地区的汉族基本上都被夷化，融入到当地世居民族之中。

1253 年，蒙古铁骑横扫云贵高原，结束了云南地方割据。元代移民多是镇戍的军卒及其眷属。《经世大典·叙录》屯戍条说：“天下平，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如……云南。”这些被遣戍的军卒中，有蒙古军、探马赤军（色目人）、汉军和彝、白等组织的爨僰军等。各族军卒，皆“即营安家”，成为移民。^⑨元代的移民虽来自不同民族，但可相互通婚，尤其明代，还特别规定色目人等“许与中国人家结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男女两家抄没入官为奴婢”^⑩。

明初，内地汉族大量迁入楚雄，其中以江南一带人口为多。此前，楚雄地区汉族移民仅占少数，且多融入当地土著民族，仅有元代入滇的一些汉族保留了本籍。自明代开始，汉族人口在楚雄州境一跃成为人口最多的民族。据方国瑜先生的统计，明初云南人口，军户占总人口的70%，原住人口仅占30%。当时楚雄州境的汉族人口无准确记载，但数量一定不少。民国《姚安县志》卷四十九：“明初平滇后，姚安留有屯军……”卷五十四：“姚安为云南一部，且汉人多吴、赣、楚籍人。明初随征入籍，音语清晰，大类中州。”嘉庆《楚雄县志》卷一：“兹邑自傅友德平定，即留兵戍守。明太祖又徙江南闽右以实之。”康熙《大姚县志·风俗》：“大姚汉少而彝多。汉人或由明时征戍入滇者，曰军家；或仕宦之后，曰官籍；或商贾流寓，曰客籍。居近城郭。”民国《盐丰县志》：“汉人则自明代以来生后各省迁居井地，然亦无由夷种变汉种者。”由此可见，明初汉族在楚雄地区的分布已经相当普遍。特别是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朱元璋即“命西平侯沐英籍都督朱铭麾下军士无妻孥者，置营以处之，令谪徙指挥、千百户、镇抚管领，自楚雄至景东每一百里置一屯种，以备蛮寇”。十月，“诏长兴侯耿业内文率陕西土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十一月，于“定边、姚安等处立营屯种”^①。张竹邦先生在《南京籍的由来》中证实：“云南的汉族，不少人家原籍南京。滇西一带，都写作原籍南京应天府。其进入云南的原因，是朱元璋攻下南京，想培植他的外甥，苦无兵，便将全城人（原文如此——笔者注）编为兵归外甥沐英指挥。沐英征云南，便将南京籍的兵全部带入。洪武十五年春，傅友德向朱元璋奏请云南共设132个千户所……大小连比合成一军。

府以上设卫，卫所的兵卒大半由内地迁来，是世袭军户，即世袭为军人携带家小戍守于指定的地方，不能随意迁动，逃亡即是犯罪。如军户死绝，则从原籍调其家族人来充抵。军户除军事职责外，另外任务就是屯田。长期以来，外籍军户逐渐与当地入融合。”^⑩这段论述中有些史实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明清进入云南的许多内地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融合并成为少数民族一分子却是事实，现今俚濮中自称祖籍南京、江西等便是如此。

内地汉族融入当地俚濮之中，以攀枝花市号称“中国彝族第一村”的迤沙拉毛姓最为典型。迤沙拉有四大姓：“起、毛、纳、张。”全村 562 户，2236 人，其中毛姓有 155 户 892 人，占全村总户数的 27.6%，总人口的 38.9%。据载，明初，毛氏始祖毛太华自江西吉安迁云南，从沐英军队几经辗转落籍今云南永胜县，娶当地女子王氏为妻，生有 8 子，姓名依次为毛清一、清二、清三、清四……清八。毛太华年老以军功携清一、清四移居湖南，其余 6 子留永胜形成永胜毛氏。明万历年间，九世毛万池一支迁移大姚县毛家湾。大姚毛氏之第五代毛尚锦等部分族人于清康熙年间迁茆却（今永仁县）之慕义里迤沙拉（当时属大姚县）定居，娶当地彝女为妻，依俗改汉归彝，至今已传 13 代。大姚、永胜两地毛姓人为汉族，但迤沙拉毛姓人则均认为是彝族俚濮人。迤沙拉毛姓“是被彝化了的汉人。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汉文化色彩很浓，但彝文化的内涵同样很重，是典型的‘彝娘汉老子’，两种民族文化非常自然地融汇在一起，成为彝汉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文化典范”^⑪。

二、明清时期汉族文化对俚濮的影响

前已述及，彝族俚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彝汉通婚的后裔，

即有汉族血统，这些汉族在与当地世居民族“白罗罗”、“嫫且”等融合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吸纳。他们带来了内地汉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传统文化，其中很多内容被后世子孙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佤濮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限于篇幅，仅举凡佤濮传统的宗法伦理、宗教信仰、节日庆典、民居、服饰、语言教育、文学艺术等，几乎都能找到汉文化的影子。

1. 宗法文化

彝族佤濮对汉文化中吸纳最为全面、系统的部分是宗法文化，从形式到内容无不体现出受汉族宗法制度的影响。宗法制度以凸族权和父权为特征，宗祠、族田、族规、族谱、族长等被认为是汉族宗法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他们在佤濮社会也同样一应俱全。佤濮历史上长期受姚安高土司统治，高氏早在唐宋之际就确立嫡系长子继承制，即父死子承，子死孙继。嫡系无子，庶系才可袭土司职。清朝政府曾规定：“凡承袭之土官，嫡庶不得越序，无子许弟承，族无可袭者，或妻或婿，为夷众信服者，亦许承袭。子或年幼，由督抚题名注册，选本族土舍护理，候其年至15岁时请袭。”^⑩高氏土司严格遵循，不敢越逾。习惯法，彝语称“简伟”。彝族民间谚语说：“祖宗制定法，子孙必遵循；前辈简伟有道理，后辈赓继简伟不迷路。”它是彝族民间调解纠纷必须遵循的原则，内容涉及所有权、财产继承、租佃、债务、刑法、婚姻、习法等。

佤濮对血缘关系极端重视，“孝亲”情感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虽然明清以来，家支制度和观念被打破，但家庭、家庭观念却根深蒂固，村落往往由两三个男性祖先的后代的家族组成，如攀枝花市迤沙拉村，号称“中国彝族第一

寨”，主要由起、毛、纳、张四大家族构成。俚濮家族和汉族一样，修族谱，定族规，编家训，定期举行祭祖、报丁、商谈族中大事等宗法性活动。同一家族，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拥有共同的姓氏；拥有一个共同公认的祖先；有一位族长；有共同的墓地和制作祖灵牌树；家族人履行互助义务；家族人联合一致对外；同宗不婚；吸纳外族加入本宗族须改从本宗姓氏。^⑤俚濮各家族都要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宗族活动，特别是农历二月初二、清明、七月半、十月招等重复进行的祭祖仪式，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丁兴旺，家族昌盛。人们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尊贵，因而许多家庭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家堂、祖先牌位。如前述迤沙拉俚濮起、毛、纳、张四大家族都建有各自的祠堂，定期举行宗族祭祖活动；永仁、大姚县俚濮的正房堂屋中供祀家堂，楼上正壁奉祀祖先牌位。不仅俚濮宗法的外部组织受汉族宗法的影响，其内部精神也无不渗透着儒家宗法伦理的价值。各家族通过制订族规、家训等形式对族人进行宗法伦理及世俗教育，并对悖逆者予以处罚。如明、清时的姚安高氏土司曾制订“高氏家训”19条，详细规定高氏家庭“思君恩”、“念祖德”、“孝父母”、“铭家庙”、“重祀事”、“慎婚姻”、“教子孙”、“恤夷民”、“禁骄奢”等家族礼法、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又如迤沙拉毛氏家族在民国年间编撰的《启祖毛氏宗祠》，其后又修撰《迤沙拉西河氏谱》和《续修毛门宗谱》，以族规、家训、排字辈等形式，对毛氏宗族内部的尊祖、孝亲、内部组织、字辈、婚姻、礼仪、社交等作了详细规定，并对违反族规的行为如淫乱、不敬父母等予以处罚，最重的为开除族籍。在族规、家训等的约束下，人们不能做出不合礼仪的举动，于是塑成了循礼蹈规，安分守

己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拘谨、守成、俭约、古朴的民俗风情。

2. 宗教信仰

佤濮信仰多教、崇拜多神。彝族佤濮原始宗教是在原始巫术的基础上的自然崇拜，佛、道和儒家文化传入后，逐渐形成了多教多神信仰的状态，是真正的“儒释道三教合流”。“佤濮彝人的宗教鬼神观念是多元化的综合体，他们既保持了彝人对自然的宗教崇拜观念，又接受了（或者说引进了）汉人的宗教鬼神观念，非常注意对于天地神和人格神的崇拜，尤其迷信对于汉族人格神的崇拜。比如对松树的崇拜，就是彝族人自然崇拜的典型表现；又如他们家家的正堂都必须供奉的神龛上，毫不例外地供奉着‘天地国亲师儒释道三教合流诸荤净诸神’的牌位，又完全是汉有家祭的风俗。”^⑥在彝族佤濮地区，普遍“信奉儒、释、道三教，迷信巫鬼的同时又保留着自然崇拜。他们信奉释迦佛、观世音。堂屋正中神龛上，供的是天地国亲师、灶神、土地、历代远祖，同时供有坛神锅龙、苍龙”^⑦。每逢有人生病或遇灾遭难，既求神拜佛，又请道士先生和巫师驱鬼送秽、庆坛。

尤其特殊的是，彝族佤濮人不仅供祀“大土主”，还有家家供奉“小土主”的习俗。1949年前，永仁、大姚等佤濮村寨都建有土主庙，小村寨则数村建一土主庙。庙有庙产，并设有管理庙产的参政。庙内塑有土主像，貌似几十岁的老人，两旁是判官、山神和土地。永仁县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土主会，四乡到苴却街朝会者达万余人。办会还要耍踩高跷、唱大戏，扮平台戏。土主主司农业、人畜疫，办会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免疫。各村寨在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均要举办土主会，各户全家携带鸡、腊肉、米、酒、香、炷等祭品祭祀土